

关注

生活中的诗意和悖论

安葵

剧作家必须深入生活,而且不能是蜻蜓点水似的、走马观花似的“采风”,应该像“下沉干部”一样地真正“沉”下去。但剧作家与下沉干部又有不同,干部的下沉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和需求从而做好工作,剧作家则要通过了解群众、做好工作为创作做准备,要寻找为创作所需要的东西,要有所发现。寻找什么?发现什么?寻找故事,发现新人,都是必须的;但更深一层,则是要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只有感受到生活中的诗意,被生活所激动,带着诗情进行创作,才可能写出堪称剧诗的作品。

近期的戏剧创作题材比较集中,历史文化名人、英雄人物、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题材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可以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题材的相近,也往往带来主题近似、构思雷同的弊端。如何避免和克服这种弊端是剧作家和理论界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近日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对一些有苗头的剧本的研讨,以及观摩一些演出,看到出现了一些好的创作倾向,这就是作者对生活中的诗意有敏锐的发现,我认为这种倾向是很值得珍视的。

比如守岛民兵王继才的事迹是非常感人的,但因为缺少故事情节,要把这一题材写成戏是很难的。读了青年作家仲春梅写的《云水谣》,虽然还不是尽如人意,但确有使人感动之处。作者说,她看了记述王继才事迹的视频,采访了王继才的妻子和其他人,深受感动,她明白了什么叫坚守。有一句话时时涌上心头:一转眼,你就不见了!王继才坚持守岛几十年,像一尊雕塑,时间似乎在凝固,但作为活的人,又一转眼就不见了。不见了,人们又不会忘记,他,成为历史的永恒!作者在生活中发现了诗意,真正被生活所感动,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一个“任务”,所以作品能有生气在。

山东的一位青年作者王娟到徽山湖区去采访,要写一个关于扶贫题材的戏,在采访的过程中,她被“船校”师生之间的关系所感动,感到教师到这样的地区来“支教”,并非简单的给予,同时也受到孩子们的激励和感染,所以在她的头脑中浮现出齐羽的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一意象成为形象的“种子”。剧本生动地描写了一群孩子对外来老师由对立到了解和亲近的过程,老师也从孩子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在磨砺中成长。到贫困地区“支教”,工作肯定是艰苦的,但当你发现有一股力量支持你,如同双桨协助,小船可以冲破风浪前行,就会感到欣喜和快乐。有了这种诗意的感受和发现,作者动起笔来就会生动活泼。

生活是复杂的,无论是历史生活还是现实生活,并不总是按照“应该如此”的轨迹前进的,常常出现很多“悖论”。戏剧诗人必须能够发现生活的复杂性,能够把诗意的发现与哲理的思考结合起来,在“悖论”中发现“正理”。

因为悖论,才会产生悲剧和喜剧,或者说悲剧和喜剧都是在悖论中产生的。在封建社会,科举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高甲戏《连升三级》却写一个胸无点墨的人一再被重用和提拔,这就构成了绝妙的讽刺喜剧。宋代诗人陆游遭遇了婚姻悲剧,因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钗头凤》词。当代剧作家王仁杰先生在他创作的《唐婉》中感叹曰:“就百年论,谁愿为此事?就千年论,不可无此诗!”如果没有悲剧的经历,陆游就不会写出这样的诗词,但谁愿意为写出好诗而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啊?这是怎样的悖论啊!

革命的进程是轰轰烈烈的,涌现出许多慷慨悲歌的人物,但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是只有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淮剧《送你过江》(陈明编剧)写一个解放军教导员与一个死去丈夫的童养媳(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村干部)相爱,但童养媳的公爹(他是船老大,是摇船过江的骨干力量)反对他们结合,而要童养媳与自己的小儿子“圆房”。如果教导员与女干部结合,就要影响“军民关系”,影响渡江。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本来是革命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但在渡江的紧要关头,这两位共产党员放弃了自己的正当要求,向“落后思想”做出妥协。怎样评价他们的行为?他们能够作出更好的选择吗?我想作品至少使我们感到,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是无数革命者做出各种各样的牺牲换来的。

正剧也不应是“坐北朝南”、四四方方一样的“正”,剧作家需要发现人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女革命家是什么样的?我们会想到鉴湖女侠秋瑾,有知识,有文化因而追求革命的向警予,在农民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刘胡兰,等等。因淮剧《小镇》而知名的剧作家徐新华为天津评剧院创作了《我的一家》,这是根据陶承的同名回忆录改编创作的。作品的主人公方承与秋瑾等人不同,他是一个不识字“淑女”,由一位贤妻良母而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她是按父母之命与一个不识字的男人结婚的,但在革命者丈夫的带动下却一步步成长起来。作品不仅表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血雨腥风,而且也表现了革命者家庭中的温暖和柔情。作品将由富有表现力的演员曾昭娟主演,舞台呈现值得期待。

李大钊是唐山人,在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唐山人感到在舞台上表现李大钊责无旁贷。他们邀请上海的剧作家刘恩平创作了《相期吾少年》。唐山评剧团是以女演员罗慧琴为“台柱子”,所以要求剧本以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为主角。赵纫兰的文字资料很少,这给创作带来很大难度,但也倒逼作者必须从新的视角去表现李大钊。李大钊结婚时才10岁,妻子16岁。“小女婿”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畸形现象,评剧《小女婿》在对这种畸形现象的否定中歌颂了新中国。但李大钊的婚姻却并非是不幸的,李大钊说赵纫兰是他的妻子,也像母亲和姐姐。赵纫兰对李大钊的成长和走上革命道路都起到了热心照顾和积极支持的作用。这说明历史生活并非是单一的。剧本还写到李大钊多次到昌黎五峰山拜谒韩愈,与这位“文起八代之衰”古代文人对话,从韩愈身上汲取了创造新文化、开辟新天地的力量。

过去往往只强调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否定甚至决裂的一面,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我们今天应该更多关注和研究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也是这部作品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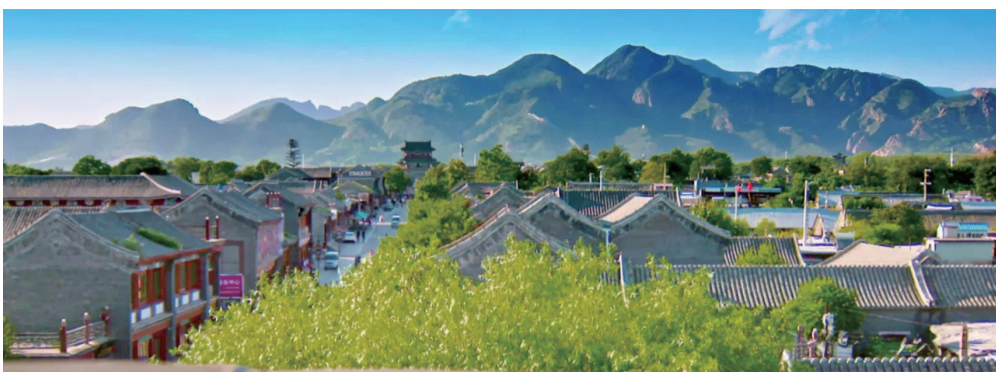
第四届老舍戏剧节闭幕话剧《我的理想生活》在京首演

“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一间是客厅,古玩字画全非必要,只要几把很舒服宽松的椅子,一二小桌……”第四届老舍戏剧节闭幕剧目《我的理想生活》近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演出以老舍先生创作于1936年的散文《我的理想家庭》为开场,引领观众进入老舍作品中的大千世界,在旧时今日的穿梭间感悟“何为理想生活”。本剧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出品制作,梧桐编剧、执导,刘伯安担纲舞蹈总监,领衔青年主创团队共同完成了一场当代年轻人对文学与戏剧的致敬。



舞台上,老舍先生6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散文《我的理想家庭》、中篇小说《月牙儿》、短篇小说《老年的浪漫》、短篇小说《善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独幕剧《火车上的威风》轮番上演。在带领观众走进老舍文学世界的同时,作品又通过设置三位“当代青年”的角色,跳出文学空间,与观众同一视角,梳理老舍著文历程和所处时代背景,结合当下解读原著。

随着《我的理想生活》演出结束,第四届老舍戏剧节也正式收官。据悉,《我的理想生活》将于2021年开启全国巡演,把老舍经典与追逐理想的精神内核带给更多观众。(许莹)



《记住乡愁》“进城了”

郭文斌

2021年元旦,《记住乡愁》第七季岳阳古城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首播,创下了收视率0.49%、观众规模1764万的收视佳绩,为同时段全国纪录片收视率第一,足见观众对它的喜爱。

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记住乡愁》创下不少纪录,无论是体量还是受欢迎程度,都是鲜见的。前六季340集,观众达170亿人次。中宣部部长黄坤明赞誉它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接地气的精品力作”。进入北师大国培班课程,被不少学校和公益课堂作为教材,被一些心理诊所作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干预手段。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节目被写入“十三五”文学成就,被列入“十四五”文学规划。

蓦然回首,我已经在这个剧组度过了7年时光。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呢?在我看来,它是电视方式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是从历史根基、当代价值、国际视野、人类高度故事化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生动回应,是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电视版的“四库全书”,是以电视方式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时代文化的价值对接,从百姓日常层面为人类解决现代性问题做出探索。我在给《人民日报》的随笔中写到: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根本,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7年之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有意思的是,在我担任节目文字统筹的第二年,小儿子出生了。老年得子,实在舍不得离开,但是又觉得这档节目太重要了,就强忍着思念,投入到工作中。《记住乡愁》的众多价值中,就有童蒙养正功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后来的家庭热播,证明了这一点。

节目在成长,编导在成长,儿子也在成长。剧组的同志大多数是年轻人,给他们讲传统文化确实比较困难。加上我是编外人员,所讲不能深、不能浅、不能急、不能缓,要非常恰当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到故事里去,难度极大,要“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当初,大家可能觉得我有些“迂腐”,两年之后,编导们都从中受益了。让我感动的是,监制王峰、制片人王海涛、主编周密,都肯定了我对节目的贡献,也肯定了我对年轻编导成长的影响。

不懂历史做不了乡愁,不懂传统文化做不了乡愁,没有家国情怀做不了乡愁,没有公益精神做不了乡愁,没有文学修养做不了乡愁。监制王峰多次讲,乡愁编导尤其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吃透。渐渐的,一种不同于其他纪录片的乡愁体在编导心中成型,一些其他频道的纪录片高手,到了剧组会晕头转向,没有一年的熟悉,很难一下子进入这档节目的创作状态。

寻找故事的文化逻辑,成了“乡愁人”首先要练就的功夫。比如第七季嘉兴古城,编导首先就要讲清楚,“红船精神”为什么诞生在这里,“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和古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什么渊源关系。这样的节目做多了,当我再讲,共产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取得成功,而没有在德国,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跟大同理想是一致的,编导们就很认同。就这样,《记住乡愁》像串珍珠一样把5000年的历史串了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一贯性。到此,编导们自然就会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讲,“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以宁夏三集为例,讲讲在各省市推荐目录基础上遴选拍摄对象的过程。

宁夏因为鲜有适合节目古建形态的村镇,目前只拍了三集,依次为单家集、南长滩和将台堡。这三个村镇,如果严格按节目形态要求,是不达标的,但经我力荐,最终编导和制片人通过了选题。没想到拍出效果非常好,特别是单家集回汉团结的故事把编导和审片领导看得直掉眼泪。踩点的时候,我们被村支书单正平的故事打动。一见面他就给我们讲汉族老乡非常感人的故事,采访汉族老乡时他们又讲回族老乡的感人故事,讲得特别自然真诚。作家的直觉告诉我,我们遇到了非常难得的大题材,但导演认为形态不达标,想放弃了。回县城的路上,我继续游说,从民族团结的角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终于打动了编导。第二天,我就带着编导再次进入单家集采访,终于通过了。

南长滩的规矩仪式对当今社会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当时采访非常不顺利。不知为何,村上最有发言权的拓校长对采访有种本能的抗拒,编导准备的采访提纲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我干脆绕开采访提纲,而是从亲情进入,当我问到他母亲的时候,他一下子把话匣子打开了。我捕捉到了一个细节,他家房子盖得很漂亮,但家具都是旧的。问他为什么。他说,所有的家具和物件都是按他母亲在世时的格局摆放的,这样,他就觉得母亲还在。由此切入,他就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的历史。

将台堡镇除了拍摄红军会师等重大主题,还拍

摄了两位返乡青年。他们在外打拼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回到家乡,在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难能可贵的是,谢宏义把红军会师纪念碑旁的一个村子买了下来,建书院,续文脉,教化一方。这无疑对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如果没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返乡,空巢空村的问题将很难解决。我随编导走过一些乡村,发现一些新农村建得比城里的房子还漂亮,但不少院门挂着大铜锁。如何让这些美丽乡村人气旺起来,将台堡镇这一期节目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由这三集节目,可见前期采访的不容易,也见编导政策水平、文史哲修养的重要,遗憾的是,由于精力有限,我不能随编导更多地到一线采访,只能在选题阶段,给予建议。接下来,制片人听取采访汇报,通过后,编导撰写选题报告,上选题会。选题会有四五位专家听汇报。如果结构不合理,主题不到位,故事设计不到位,都要打回去。大多选题,要上两三次选题会,少数要上四五次,还有一些,最终被否决了。事实上,选题会已经是可操作拍摄脚本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拍摄过程高效、经济。

第五季之后,选题难度明显加大,多位在第一至四季的优秀编导一下子捉襟见肘,因为从村镇到古街区古城,时空一下子扩展了很多倍,特别是到了古城,要在不到30分钟的节目里,讲清楚它的前世今生,难度可想而知。要让编导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吃透杭州、开封这些古城,找到五六位人物、故事,真如大海捞针,一出节目事实上就是一部电影,一部电影要拍出来需要准备多长时间,《记住乡愁》每年60集,相当于60部电影,一个电影团队有多少人,《记住乡愁》每出节目也就一位编导,两位摄像,不超过10个人,工作量超大。

片子剪成之后先在小组初审,小组初审通过之后才拿到专家组进行审片,几乎有一半片子要打回去修改。

到了第三年,编导团队基本上掌握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时代文化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理解,制片人王海涛体谅我的家庭情况,让我从文字统筹渐渐向策划和撰稿过渡,从微观向宏观过渡,让我在北京、银川两边跑。

我做越觉得这出节目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的重大。我常常给编导们讲,如果把孔子和老子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拍下来,在今天真是价值连城。《记住乡愁》是国宝。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我坚持了下来。有人问,《记住乡愁》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生产力,我说,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王峰、王海涛、周密三人的亲密状态,那种和气真是少见。他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高度一致。7年来,我没有发现他们出现过价值观和方法论裂痕。我也常常看到他们在听选题和审片的时候,一阵窃窃私语,那肯定是心灵深处的一种默契和会意。有时,王峰也会像长辈一样校正一下王海涛的观点,王海涛常常是认账地一笑。但这种校正和认账,恰恰说明他们之间没有生分,没有客气,只有和谐。

喜欢听他们三人说选题、评节目。常想,如果录下来,将会是非常珍贵的电视档案,有时候,一出节目,他们会讲一节课。

7年中,安徽大学的刘伯山教授、传媒大学的沈晔教授、清华大学的彭林教授、曲阜师范大学的夏静教授,诗人张海龙先后以专家和撰稿人身份加盟团队,或者一年,或者两年,从他们的发言中,长了不少见识。

30分钟节目,坐在电视机前,会很快看完。但拍摄过程却是千辛万苦,需要二三百个镜头,每一个都要挪动机器,布置场景,甚至组织活动。

在拍天水古城的时候,我作为天水籍作家出境。有一天,在八卦山上拍了8个小时,结束之后,我一屁股坐在山头再也不想起来,只想就此睡过去。站久了,只感觉腰都不存在了。我是空手配合,尚且如此,编导扛着重重的设备上山,找位置,其辛劳,可想而知。有时候为了拍落日,抓光线,根本顾不上吃饭。

不同于编导们,我一边参与节目创作,一边尝

试把它应用化,通过我的手寄到全国应用性平台的光盘占了很大比例。比如经我牵线,剧组就给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宁夏司法厅等单位捐赠了大量图书、光盘,供他们研究和开发。

在海口电视台录制的52集《郭文斌解读弟子规》中,我引用了大量《记住乡愁》案例,随着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播出和学习强国的推送,受益人群逐渐扩大。

寻找安祥小课堂、文明十二家等团队,周一集,播放节目。北京易生康集团的刘广平到小课堂学习后,自愿向全国有联系的学习群发送节目,每天一集,常年不断,尤其让人感动的是,每一集,他都要写一篇观后感,一集不落。要写成这样一篇文章,至少要把节目观看三四遍。《黄河文学》编辑部的编辑李杨佳伟把前四季每一集节目里的五个故事都挑出来命名,便与检索。这些应用性价值反馈,给编导以很大的激励,让编导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前瞻到它的济世功用。

我讲课时常常引用四川德胜村的故事。两青年打架,一个把另一个的眼睛打瞎了,肇事者逃逸,不想受伤者祁永兵不但没有计较,反而去帮肇事者的妈妈种庄稼。记者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心怀仇恨,他不快乐,我也不快乐,把仇恨忘掉,他快乐,我也快乐。这些年我用这个故事劝和了许多心怀抱怨的人,仇恨的人。这种乡愁故事和电影不一样,电影是虚构的,纪录片是可以作为论据使用的,而且是央视这种有公信力的媒体拍摄的纪录片。

广西有个罗凤村,每天早晨,大家在上工的时候,把要卖的菜拿到这个市场悬挂在树上,在旁边放一个收钱的袋子,把菜标明价格人就走了,需要买的人去把菜拿上,主动地把钱放在那个钱兜里面,人走,就是说卖家和买家是不见面的。100年来,却从没有发生过谁多拿了菜,谁少给了钱的情况。它们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真实存在。我一直在讲一个观点:把《记住乡愁》认真真地看完,那些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者他会找到信心,文化虚无主义者他会找到真实感,那种道德悲观主义者他会找到乐观,那些迷茫无助的人他会找到人生方向。我们可以想象当社会上每一个村落村镇,每一个商店社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就是大同社会吗?

应该说,节目进入第七季,杭州、开封、九江、高邮这些古城展开在编导面前,除了体量变大,难度变大,编导也进入疲劳期,该用的词都用完了,该用的结构也用完了,该用的方法论也用完了,怎么再上新台阶?我给制片人建议:一档节目如何变成国家的刚需、百姓的刚需、文化传承的刚需,人类走出困境的刚需,这既是坚守也是创新。就像我们再怎么创新还是要晒太阳,再怎么创新还是要吃大米,再怎么创新还是要喝水,再怎么创新还是要呼吸空气。最重要的是守正。

创新主要是在形式感上创新,在方法论上创新,而它的精神价值一定是守恒的,这也是《记住乡愁》和其他节目相比,能够持久性的被观众认可的原因。

在现在,无论是教育,还是文化,还是传媒,一定要走“社区推送”的道路,也即精准推送。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要想到机缘分内的受众精准对接。对于这部分观众,广告性传播意义不大,主要靠口耳相传,和受益性传播。把作品变成受众的刚需,这就需要我们对社会、对基层,特别是对当代人的心灵到底发生了什么,心灵到底需要什么作出准确的诊断、判断、感知。所以要提高对社会的感受力、判断力,要知冷知热,用心体会当代人心中对坑洞和缺陷。

多年的志愿者经历让我知道如何走进真正需要我们的受众中间去。我发现,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特别需要精准服务,比如建群,比如线下课堂,也特别需要服务者保持定力和耐力,一场接一场的不厌其烦反复讲一个观点,反复推送一部经典,用文火,把一锅馒头煮熟。没有病的人是不会进药店的,没有饥饿感的人是不会进餐馆的。一出节目,一本杂志,一份报纸必须走刚需路线,就是带着问题意识,带着前瞻性,带着爱和情怀,精准推送。

